

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谱系及其当代价值

——从马克思、列宁到葛兰西

廖胜刚

(吉首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马克思在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欺骗性”和研究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和人类文化发展的载体的精神生产现象时揭示了“思想的生产与分配”的规律。列宁和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不再一般地谈论意识形态虚假性,而是强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及其实现战略。马克思、列宁及葛兰西在意识形态批判、建构过程中揭示的阶级社会和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领导权;灌输;话语;大众传播媒介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8)06-0085-05

人们似乎同意这种说法,葛兰西把依靠暴力机器进行政治统治称之为“专政”,而把思想道德称作“领导权”^{[1]66-67}。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的理论渊源,有人却认为与马克思、列宁无关^{[2]12}。我们认为,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概念,但他阐述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调节思想的生产 and 分配”理论就是他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学说。马克思、列宁及葛兰西“领导权”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列宁、葛兰西的思想又是独特的、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及葛兰西建构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谱系揭示了阶级社会和作为人类文化现象的意识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是从他的唯物史观出发阐述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们的物质条件状况、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思想状况和地位。因此,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此外,统治阶级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

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97-98}。如果把思想“领导权”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状况,那么,思想“领导权”的含义又是什么呢?马克思告诉我们,思想“领导权”就是思想、理论的影响力、说服力和战斗力。他告诉我们,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9}可见,思想、理论“领导权”是阶级社会的客观存在,是由统治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的;哲学只要为无产阶级所认同、掌握即实现“领导权”,就能变成自身解放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关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唯物史观显然没有论证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具体形式,但他区分了“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与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4]31},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发生机制。受黑格尔精神分析学关于人的异化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发现:“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的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

* 收稿日期:2008-03-24

作者简介:廖胜刚(1964-),男,苗族,湖南泸溪人,哲学博士,吉首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着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5]15}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共同利益的一种组织形式，或者说，公共利益是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的一种虚幻共同体形式，因而事情是这样的，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就像无产阶级那样，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他们描述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3]83-84}。为此，统治阶级还要将一定反映本阶级意志和利益的政治、法律、哲学、宗教以及艺术等意识形态诸形式灌输给社会成员，实现文化和思想“领导权”。正如马克思所说：“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5]611}当然，对马克思来说，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氛围是一个虚假的、颠倒的精神世界，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意识形态的教育和灌输是对人的非人化的训练，使人成为甘愿接受统治的奴隶。因此，“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5]289}。

意识形态作为“阶级社会的维护意识”，是一个诸种观念和表征的系统支配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它主要通过制造社会的意识形态氛围，把一定的思维方式和信念、价值观灌输给社会成员来实现“领导权”。在马克思的“领导权”理论中，思想、理论“领导权”由一定阶级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任何阶级或集团要取得和维护其思想、理论“领导权”必须首先夺取政权，同时加强思想、理论灌输和教化工作；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解放必须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加倍努力，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4]635}。

—

列宁对马克思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重大贡献既表现在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又表现在他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党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过程中特别强调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从而取得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列宁反复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6]311}，“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党人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

又不同于俄国。”^{[6]273-274}列宁指出：“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6]272-273}当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领会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当这些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工人中间成立坚固的组织，俄国工人就会起来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因而，“不做上述理论工作，便不能当思想领导者；不根据事业的需要进行这项工作，不在工人中间宣传这个理论的成果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也不能当思想领导者。”^{[6]78-79}

俄国革命的特殊性——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不久、反专制制度以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落后、社会主义思想脱离劳动阶级现象严重——决定了列宁及其党特别重视实现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工作。列宁反复强调：“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应该设法继续发展并且实现这个理论，同时要保卫它，使它不致像许多‘时髦理论’那样常常被曲解和庸俗化。”^{[6]270-271}所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除了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以外，同时还要在工人群众中间广泛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是为领导俄国工人的阶级斗争所必需的，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无论前一种鼓动或后一种鼓动，都能唤起工人觉悟，组织他们，使他们遵守纪律，教育他们进行一致活动并为社会民主主义理想而斗争”^{[6]143-144}。所以，“我们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6]342}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7]132}在列宁看来，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工人阶级头脑，才能发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政治意识，从而为推翻旧社会奠定理论基础。

受卡·考茨基关于“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東西，而不是一种产生出来的东西”的观点的启发，列宁系统论证了社会主义意识“灌输论”。他说：“俄国社会民主党所应该实现的任务：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6]284}因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6]316-317}列宁认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

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所以,对于怎么办才能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这个问题,决不能只是做出往往可以使实际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倾心于‘经济主义’的实际工作者满意的那种回答,即所谓‘到工人中去’。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6]362}为了做到这点,“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工作应当研究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一切特点,这是谁也不怀疑的。但是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少很少,同研究工厂生活特点的工作相比,未免太不相称了。”^{[6]365}

总之,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既是一种“虚幻观念”、“虚假意识”,同时又是“观念上层建筑”,不仅资产阶级社会而且无产阶级革命也需要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并注意到教育、灌输在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中的重要性。列宁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并结合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不再一般地谈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是特别强调在经济文化落后、资产阶级享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社会里,无产阶级必须加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灌输工作。只有瓦解资产阶级思想“领导权”,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成功。

三

路易斯·阿尔都塞认为,只有葛兰西真正试图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探索和研究,这种观点也许有些偏颇。但“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纯经济力量的影响使葛兰西创造了‘领导权’原则,至今人们仍认为,这是同葛兰西关系最为密切的概念之一”的说法却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8]2}。总体来说,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是探索在先进工业社会复兴马克思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战略的一次尝试。

与马克思不同,葛兰西把资产阶级统治结构分为经济社会、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三个部分,在此基础上阐明某个阶级或社会集团如何建立独立于直接的政治权力之上的思想、文化和道德方面的“领导权”。葛兰西指出,一个政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意味着该阶级成功地说服了社会其他阶级接受自己的道德、政治以及文化的阶级观念并予以认同和服从。他研究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构成,划分出国家实行阶级统治的两种方式。“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这些职能都是有组

织的、相互关联的。”^{[9]7}也就是说,“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权力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权力,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9]38}正如意大利的博比奥所说,葛兰西实现了上层建筑凌驾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领域中意识形态凌驾于组织机构之上的两个颠倒,从而建构了思想“领导权”理论。

在葛兰西看来,文化是内在自我的组织与纪律,是对自我人格的把握,是对更高层意识的获取。通过获取这种意识,人们就能理解自己的历史价值,理解自己在生活中的职能,理解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因而,文化“领导权”的每一种关系必然是一种教育关系,它通过各种有组织的文化事业——学校、教会、出版机构、传播媒介等扩展到市民社会,进而渗透到民族共同体的一般“文化精神”中。因此,要大力发展各级学校和教会,它们是最大的文化组织。然后是报纸、杂志、书籍出版、私人教育机构,它们都或者是国家体系的补充,或者是像群众大学那样的文化机构^{[9]253-254}。由于每个社会集团既然产生于经济社会原初的基本职能领域,它也同时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有机知识分子阶层在市民社会及文化霸权的实现过程中具有领导文化和总体意识形态的作用。因此,“任何在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作斗争,该集团越是同时成功地构造其有机的知识分子这种同化和征服便越快捷、越有效”^{[9]5-6}。无产阶级必须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并且同化和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借助于创造和传播科学、哲学和艺术等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正如本·阿格尔所说:“群众有‘感情’,而知识分子‘有知识’。没有群众,知识分子就会落到‘迂腐’的地步;没有知识分子,群众则会沉湎于‘盲目的热情和宗派主义’,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把工人的异化和失落感变成能从历史和结构角度阐明工人这些体验的连贯的理论体系,并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10]157}

不难发现,葛兰西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同时又是独特的、创造性的。他的理论贡献在于对上层建筑因素给予了经常的甚至是优先的关注,首次阐明了意识形态“领导权”在准备夺取政权和维持现有政权的阶级或集团政治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西班牙的卡列拉评论说:“葛兰西在理论上的深思和在政治上的斗争,无疑对二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欧洲起了一个勇敢革新的作用。在这种意义上,葛兰西是个

修正主义者,虽然像列宁那样,葛兰西的修正主义具有进步性而无反动性。”^{[11]30} 保尔·兰色姆也说:“葛兰西进一步清除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中的否定因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概念,‘文化霸权’这一术语是用来描述任何赢得并掌握了权力的社会群体所拥有的世界观。”^{[12]60} 葛兰西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思想“领导权”、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建立自己“有机知识分子”队伍、为同化和“在意识形态上”征服传统知识分子在作斗争等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四

20世纪5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终结论”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话语,特别是90年代苏东剧变后,西方许多人欢呼“历史的终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实的发展似乎已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它们的解释能力,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谱系的理论图景似乎丧失了它的重要意义。其实不然。“终结论”之后西方世界意识形态发展的逻辑进程事实上已经对所谓后工业社会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做出了当代解读,从而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在当代社会的认知、解释和政策价值。

它首先告诉我们,意识形态“领导权”是阶级社会上层建筑、政治体系的普遍现象和共同特征,它没有也根本不会“终结”。美国政治学家加塔诺·莫斯卡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话:“在人口众多并且已经达到一定文明水平的社会,统治阶级不是仅仅通过拥有权力这一事实来使权力正当化,而是试图为之寻找一个道德与法律的基础,把它表现为人们通常认可和接受的原则与信仰的逻辑的必然的结果。”^{[13]11} 英国的汤普森同样颇有见地地指出:“关于意识形态时代即将告终的看法不是一个新的看法,也不是所有认为意识形态是现时代鲜明特征的理论家的共识;这种看法可以视为构成一种对文化转型宏大叙事的特定(不是一般共有的)扭曲。”^{[14]89} 他肯定:“列宁和卢卡奇虽然强调无产阶级意识不一定由无产阶级在事态发展中所产生,他们却重视阐明和扩散这种意识形态以便克服革命的障碍。”^{[14]51} 美国的迈克尔·H·亨特发现发达国家意识形态在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事实上,只要试图对美国如何进入国际政治密林,或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进行深入的探讨,意识形态都占据着显著地位。”^{[15]35}

尽管马克思深刻批判了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欺骗性,但他也强调了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即在社会生存条件之上耸立着的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的意义,即作为文化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列宁、葛兰西建构了作为科学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它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文化的意识形态由一定社会经济基

础、物质生活条件、社会历史传统等因素决定,因而无法逃避。“它远不止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和工于计算的资本家出于一己利益所操纵的工具,而是社会的象征符号、价值观同信仰相结合的完整体系。”^{[15]13} 因此,仅仅把意识形态理解为统治阶级的操纵工具的想法是片面的。戴维·凯特勒告诉我们:“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或方式,并否定其他一些行为模式或方式。”^{[16]345} 意识形态指示着历史运动的方向,为理解复杂的现实提供简单的模式,维持或影响政治体系的生存与稳定。因此,“意识形态是指解释一个社会的系统方法,它或者为这个社会辩护,或者批判这个社会,成为为维持、改造或摧毁这个社会而采取行动的依据。”^{[17]9}

其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思想还强调了加强意识形态的灌输、宣传和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马克思曾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8]。美国政治学家安东尼·奥罗姆发现:“对马克思来说,达到他作为理论家所获得的变迁知识与他从革命信念中滋长出来的变迁愿望这两者的综合,这只不过是一小步。他认为,作为革命的倡导者,在由变迁认识武装起来之后,把这种认识传播到变迁的主要受益者即工人阶级中去,从而启发他们,加速变迁,是他本人义不容辞的职责。”^{[19]17} 事实上,在美国社会,意识形态“霸权”是美国社会思想控制的重要形式,它是媒体、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机构建立和演化的结果。新闻媒体一方面对符合自由保守光谱的事实大肆报道,一方面对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事实轻描淡写来强化霸权;教育体制则通过训练人们服从权威,向孩子灌输隐含霸权的基本观念(在他们成人后将继续认可)来巩固霸权;同时霸权也体现在所谓的新话语过程里。思想观念方面的引导和控制是一个社会政治统治的一项十分重要或者说更为有效的条件。可见,“任何社会为了生存下去都必须成功地向社会成员灌输最适合于维持其制度的思想。”^{[19]365} 一个社会的政治系统要有意识地向社会成员灌输现行政治制度的规范和政治行为准则并对其行为进行有效的调节和控制,以保持政治秩序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的“灌输论”仍具有现实意义。

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国家“第四权力”本质上是为现存社会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或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直接履行着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职能。“毫无疑问,大众传播媒介在当代的政治思想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370} 但“大众传播媒介并不仅仅是灌输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若干机制之一;说得确切一点,这些媒介恰好部分地构成了现代社会中进行政治活动的论坛。”^{[14]304} 布热津斯基早就看到:“对于世界的大多数人——特别是年

轻人——来说,电视是接触社会和接受教育的最重要工具。在这方面,它正迅速地替代历来由家庭、教会和学校所起的作用。”^[20]^[21]在西方工业社会,大众传播媒介既传播必要的社会价值标准,提供效率、意志、人格、愿望和冒险等方面的完整的训练,又是国家的话筒,代表整个国家权力。马尔库塞在驳斥“信息和娱乐媒介论”时也告诉我们:“大众传播媒介表面上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但实质上不发挥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21]⁹。在现代社会里,大众传播媒介以其巨大的渗透力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灌输和意识操纵,创造了一个无形而又庞大的言论空间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于生活的想象力。大众传媒作为重要的思想文化阵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党和国家生命所系的工程。

参考文献:

- [1] (苏)阿·波波夫,等. 葛兰西思想的现实意义[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88(1):68-70.
- [2] 吕裕阁. 十年间(1978-1987)意大利对葛兰西的研究[J]. 理论前沿,1989(77):10-12.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 [6] 列宁选集(1)[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 毛泽东文集(8)[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8] (英)詹·约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 [9]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10] (加)本·阿格尔.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 [11] (西)N·L·卡列拉. 葛兰西和法律[J]. 国外社会科学,1980(5).
- [12] 张怡. 葛兰西的文化政治思想[J]. 外国文学,2000(4):58-63.
- [13] (美)加塔诺·莫斯卡. 统治阶级[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 [14] (英)约翰·B·汤普森.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 [15] (美)迈克尔·H·亨特.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 [16] (英)戴维·凯特勒. 意识形态[G]//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 [17] (美)莫里斯·迪维尔热. 政治社会学[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 [18] 张丽玲.“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源探[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16-19.
- [19] (美)安东尼·奥罗姆. 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 [20] (美)布热津斯基. 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21] (德)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刘荣军

On the Discourse System and Its Contemporary Worth on Ideology “Leadership”

——From Marx, Lenin to Gramsci

LIAO Sheng-ga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Management,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Abstract: Marx had revealed the law of thought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process of criticizing “falsehood” and “deceitfulness” of ideology and researching spiritual production phenomenon as the carrier of social superstructure and mankind’s cultural development. Lenin and Gramsci developed Marx ideology theory. They no longer discussed the falsehood of ideology generally, but emphasized “leade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ideology and its realization strategy. The thought of ideology “leadership” in class society as human culture phenomenon that Marx, Lenin and Gramsci have revealed in the process of criticizing, constructing ideology is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

Key words: ideology; Marxism; leadership; infusion; discourse; mass media